

語言分布發展的擴散論與類型論*

洪惟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5) 639–661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5583250
lin.sagepub.com



本文站在理論地理語言學觀點，評介施密特提出「波傳論」以後，日本及西方所提的一些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並提出新的理論。本研究提出「洪水論」，以補充「波傳論」之不足；並檢討一個新語由插入舊語分布區發展為包抄的語言空間發展連續過程階段分類的可能性。本文支持四分法，因為它最方便進行演繹法的分類。

關鍵詞：理論地理語言學，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擴散論，類型論，演繹性分類

1. 地理語言學理論

語言地圖的繪製是地理語言學的主要工作之一。不過，這不是說一定要繪製地圖才算是地理語言學研究，只能說地圖繪製是呈現地理語言學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也不是說語言地圖畫出來了，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就算大功告成了。

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地圖繪製之後，要對語言或方言的分布狀態進行所以然的解釋，說明語言為什麼會這麼分布，追究語言或方言所以如此分布的動機、動力及其歷史過程。

地理語言學的基本課題是建立於解釋語言地理分布的理論。沒有理論，便不知道如何進行解釋，甚至不了解地理語言學研究的意義何在、不知道如何進行地理語言學研究。我嘗試把地理語言學的理論分為四個分科：

- (一) 分布論：討論語言地理分布的表面形態、分布類型以及空間關係；
- (二) 發展論：討論語言地理分布空間發展的模式及其類型；
- (三) 生成論：討論語言地理分布所以形成的動機、動因及語言地盤變動的機制；
- (四) 擴散史論：討論如何判定語言擴散的起點並追究其擴散過程。

* 本文原稿於 2012 年 10 月 19–21 日在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會前承蒙岩田礼教授、會中承蒙大西拓一郎教授、會後承蒙項夢冰等多人的討論與指教，又蒙匿名審查人承賜許多指正，受益良多，謹此致謝。本文為多年來「國家科學委員會」（今改名「科技部」）研究補助的成果之一，謹此一併致謝。

這四個分科之間息息相關，但「發展論」是中心理論。「發展論」可以再細分為「擴散論」與「類型論」。「擴散論」討論新的語言或語言變體在空間擴散的模式，「類型論」討論擴散之後發展的類型。本文討論「發展論」相關的課題及其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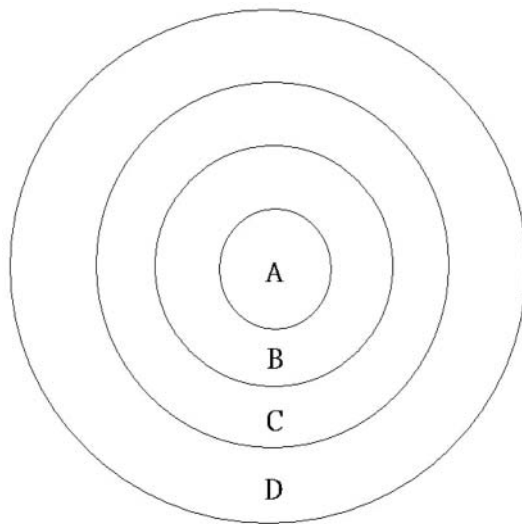
2. 語言地理分布的擴散論

研究語言地理分布如何擴散的課題謂之「擴散論」。「擴散」可分連續性擴散以及不連續擴散，本文只討論連續性擴散理論。不連續擴散的發展過程不同，需要另外討論（詳參洪惟仁 2010）。

本節討論「擴散」的模式，以及根據此模式對於語言表面分布狀態的解釋理論。

2.1 連續性擴散的基本模式：施密特的「波傳論」

施密特 (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 1872 年提出有名的「波傳論」(wave theory/wallentheorie)，這個理論認為新形成的變體由一個點產生，然後開始向周圍擴散，其過程可以比喻成投石於水，水波由落石點向外擴散，形成同心圓狀的水波。



〈圖 1〉施密特的語言波傳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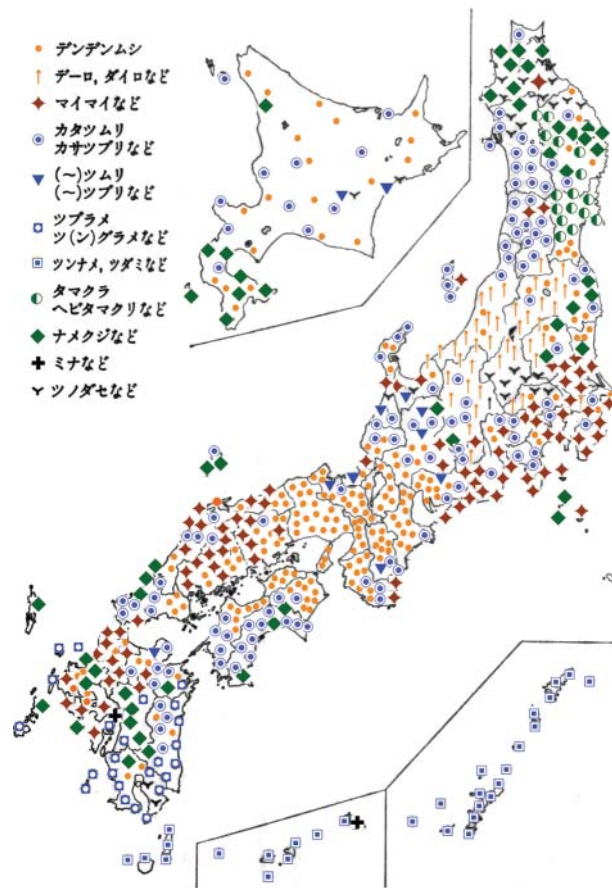
如上圖所示，新興的形式由中心的 A 向周邊 B→C→D 的方向擴散。「波傳論」可以說是連續性擴散論的基本理論，本文所討論的一些擴散論，如「鄰接分布原則」、「方言周圍論」、「周邊分布原則」、「洪水論」，都可以由「波傳論」延伸出來，可見「波傳論」具有相當大的概括性。

2.2 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圍論」

柳田國男 (Kunio Yanagita, 1875–1962)¹ 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圍論」。柳田在所著《蝸牛考》(1930) 將日語「蝸牛」的方言變體分為五類：A ナメクジ系、B ツブリ系、C カタツブリ系、D マイマイ系、E デデムシ系，發現這五類變體呈現這樣的分布狀態：

A - B - C - D - E - D - C - B - A

實際的分布如〈圖 2〉所示：



〈圖 2〉日本「蝸牛」變體分布圖

資料來源：引自徳川宗賢《日本の方言地図》(1993:15)，洪惟仁著色。

¹ 柳田國男 1875 年出生於日本兵庫縣，曾任記者、作家、民俗學者，其方言研究多屬民俗相關資料蒐集。其名作《蝸牛考》為日本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原刊《東京人類學雜誌》(1927)，1930 年由刀江書院出版，修訂版由創元社再版，後收入岩波文庫。其「方言周圍論」給日本的方言學、地理方言學帶來很大的影響。

柳田國男的「蝸牛」變體分布圖乃根據通信調查蒐集的資料繪製，資料不足。原圖漫漶不清，且第二版以後就不再附圖，而改以表羅列三百餘種變體，只註明其分布地點；變體分類也有調整（增加ミナ類，柳田認為是最原始的變體）。上圖採用德川宗賢就國立國語研究所《日本言語地図》終卷（1974）所載的三張地圖，並參考柳田國男的分類，重新歸類，以便檢驗柳田國男理論所重繪的地圖。此圖較柳田原圖翔實、精確，更能體現「古語殘存於邊境」的主張。但原圖為黑白圖，收入《日本の方言地図》（德川宗賢 1993:15）。〈圖 2〉為筆者修飾，符號略有修改，並加以著色，以便更容易理解。所用色彩基本上沿襲柳田國男初版（1930）地圖的用色，但略有修改。² 兩張地圖有關變體分類及顏色意義之關係對照如下表：

〈表 1〉日語「蝸牛」變體分類系統對照表

編號	柳田分類	德川分類	顏色
E	デデムシ系	デンデンムシ (dendenmushi)、デーロ (de-ro)、ダイロ (dairo)	橘色
D	マイマイ系	マイマイ (maimai)	褐色
C	カタツブリ系	カタツムリ (katatsumuri)・カサツブリ (kasatsburi)	藍色
B	ツブリ系	(～)ツムリ (~tsumuri)、(～)ツブリ (tsuburi)、ツブラメ (tsuburame)、ツングラメ (tsungurame)、ツダミ (tsurami)	
A	ナメクジ系	タマクラ (tamakura)、ヘビタマクリ (hebitamakuri)	綠色
其他	ミナ	ミナ (mina)、ツノダセ (tsunodase)	黑色

如地圖所示，E 有兩個中心，其他的變體都分布在中心的周邊地帶，變體的分布大體上呈現 a-b-a 的相對關係。A 在最邊緣，A 包圍 B 和 C，B 和 C 包圍 D，D 包圍 E。柳田國男考證各種變體的歷史，發現最古老的變體是 A，然後 B→C→D→E，E 是近畿最近產生的新變體，所有變體都是由京都往外層層擴散，越遠離近畿，保存著越古老的變體。³ 柳田國男因此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圍論」，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也就是說方言地理變異，周邊一致性的變體是存古的，中間的變體是後來插入的新形式。

根據表面的分布狀態來判斷何者為新語，何者為舊語，等於企圖把「擴散論」應用到語言史的研究領域，也可以說企圖把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延伸為「歷史地理語言學」(historical geolinguistics)。提出這個議題並加以論證是柳田國男的貢獻。

² 如圖表所示本文 B、C 同用藍色標示，意味本文作者認為兩者應該合併為一類。按 B（カタツブリ系）和 C（ツブリ系）只有部分不同，詞根（-tsubu/tsumu-）一樣，參考 A 類タマクラ (tamakura) 和ヘビタマクリ (hebitamakuri)，詞根相同，卻可以合併為一類，為何 B、C 要分為二類。再看 B、C 二類具有互補分布關係，合併之後正好構成一個完整的包圍 D、E 的區塊，更能驗證「方言周圍論」的主張。德川宗賢（1993:18-19）在論及各種變體的分布時，也往往把 B、C 二類並舉。

³ C 是現代標準語，北海道的 C 可能是新開地接受標準語跳躍擴散的結果；沖繩的 B 應該是由九州擴散去的。柳田國男（1930）的原始地圖沒有北海道和沖繩的資料。

「方言周圈論」另一個含意是認為擴散源來自「中央」，也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就是漢語所謂「中原」）。「古語殘存於邊境」的意思相當於中國古語所謂「禮失求諸野」的意思，日本文獻上也有不少「古詞多殘存於鄉野」的說法。⁴但是把這個觀念落實到地理語言學理論並用大量的語料與文獻論證這種主張是柳田國男的功勞。這個理論因為主張語言變體的擴散源在「中央」，對於「擴散史論」也有貢獻。

柳田國男雖然是民俗學家，但是他的學識淵博，很有洞察力。他到晚年曾經透露他的「方言周圈論」的靈感來自德國農業經濟學家 J. H. von Thünen 名著《孤立國》的同心圓理論模式 (Model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Thünen rings) 的啟發，並非直接承襲自施密特的「波傳論」，但基本概念是相似的。⁵

2.3 柴田武的「周邊分布原則」

雖然柳田國男是根據文獻考證日語「蝸牛」的方言變體擴散史，作出「古語在周邊」的結論，但是反過來，提出所有分布在中央的變體都是新語，所有分布在周邊的都是舊語的主張，這就變成「原則」的論述。

柳田國男似乎還沒有企圖把他的「方言周圈論」看成是根據語言地理分布論證語言史的「原則」。柴田武⁶ (1969) 接受了「方言周圈論」，並且進一步應用到語言史論的第二原則「周邊分布原則」。他把柳田國男的概念抽象化，作成如下的論證模式。

假定有三個鄰接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又假設這三個聚落屬於同一個語言，其方言變體分布成這樣的狀態：

a — a — a

⁴ 如德川宗賢 (1993:14) 指出荻生徂徠 (1728 歿)、本居宣長 (1801) 都曾提出「古詞多殘存於鄉野」的說法。

⁵ 柳田國男自承他的「方言周圈論」是受到農業經濟學家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1783–1850) 所著 *Der Isolierte Staat* (《孤立國》，1826) 一書的影響 (見柳田國男〈わたくしの方言研究〉1961:313)。但他沒有說明怎麼樣受到影響。Thünen 在《孤立國》一書中提出「農地使用模式」(Model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他以城市中心畫出同心圓，距離圓心越遠，運輸成本越高，生產利潤越低。《孤立國》所繪的同心圓模式和〈圖 1〉施密特的語言波傳模式完全相同，重點都在「中心」地帶的影響。可見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的擴散源概念並非直接受到施密特「波傳論」的啟發，而是受到農業經濟學的啟發。

⁶ 柴田武 (Takeshi Shibata, 1918–2007) 生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1969)，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有名的方言學家，專研方言地理學、社會語言學。著有《日本の方言》(1958)、《言語地理学の方法》(1969)、《方言論》(1988) 等。

三個聚落的方言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同質性變體成連續性分布，這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方言變體形成這樣的分布狀態：

$$a - b - a$$

周邊方言一致，而中間的方言不一樣。柴田認為這樣的分布狀態可以判斷 *b* 是新語，而 *a* 是舊語。這就是「周邊分布原則」。

「原則」比「論」應該要嚴格一點。柳田國男只是指出「蝸牛」的方言變體分布的現象，並沒有把「方言周圍論」當成一個普遍的「原則」，甚至做為一個理論是否可以成立也沒有自信，更沒有主張所有的詞彙都是以京都為中心向外擴散，⁷ 而柴田武把它當成一個「周邊分布原則」。他所謂的「原則」是什麼意思？是否等於物理學所謂的「定理」(law) 或青年語法學派所謂的「定律」(law) 呢？如果是的話，「原則」是不能有例外的，因為只要有一個例外，相當於「定理」或「定律」的「原則」就不能成立了。

柴田武 (1969:32) 就「周邊分布原則」作了兩點說明：

- (1) 由地理分布推斷語言發展的歷史，有一個前提，就是語言的傳播必須沿著地面爬行。(柴田武 1969:28-29)
- (2) 也可能有周邊為新語，而中央為舊語的反例，但是機率很少。(柴田武 1969:32)

根據說明 (1)，所謂「周邊分布原則」只是為了解釋「沿著地面爬行」的語言傳播現象，也就是本文所謂的「連續性擴散」，不沿地面的遠距傳播，如移民所產生的錯雜分布，以及如炸彈爆炸般飛散各地的標準語變體之類的傳播不在本原則涵蓋之內。

由理論模式看來，所謂「方言周圍論」或「周邊分布原則」和「波傳論」是一樣的，因為「波傳論」基本上也只處理「連續性擴散」，不同的是「周邊分布原則」提出可以根據方言地理分布的表面狀態推論是新語或舊語的「原則」，說得比柳田國男更肯定，這是柴田企圖對語言擴散史論作出貢獻。

根據說明 (2)，所謂「周邊分布原則」是可以允許「例外」的，只是例外的情形很少發生。根據這點說明，柴田的「原則」不是「定理」，只是一種「傾向」(tendency)。這意味著周邊的變體是新語而中間的變體是舊語的反例⁸（如本文所謂的「包抄型」）也是可能的，只是較少發生而已。但柴田不處理這些可能的反例。

⁷ 柳田國男晚年說：「（方言周圍論）是否可以成立我不知道，我現在也不堅持原來的理論，是不是所有的詞彙都一樣以京都為中心波紋似地向外擴散我也不敢說。不過小地域確實像波紋一樣，其邊境現象是可以確定的。雖然邊境現象很有意思，不過是否能夠成為『法則』，其實我還不能確定。」（柳田國男〈わたくしの方言研究〉1961:313）

⁸ Chambers & Trudgill (1998:168) 在批評 “spatial linguistics” 的周邊分布原則時就舉出英國方言地理分布的反例，即 /j/ 脫落的變體分布在英格蘭的周邊，但它卻是創新的形式，而保守的完整 /j/ 變體分布卻在中間。

由上可見，柴田武並未企圖從普遍的語言分布「發展論」立場來探討所有的分布類型及其發展，卻又直接運用到擴散史論。由本研究看來，他是把問題侷限在解釋語言擴散的初期階段（即插入型的發展階段），指出在這個階段的語言分布狀態可以採用「周邊分布原則」來解釋，但對其他的例外卻存而不論。

2.4 語言連續性理論與鄰接分布原則

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最基本的原則是「語言連續性」理論。這個理論不止用在地理語言學，也用在所有的語言變異或變化。所謂「語言連續性理論」是認為語言或方言變體的常態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都具有「連續性」 (continuity)，不論是語言自然的歷史變化 (historical change)、地理變異 (geographical variation) 或社會變異 (social variation)，所有變體 (variants) 在歷史上、社會上、地理上的常態分布都具有「連續性」。因此語言的變異必然形成「漸層分布」 (gradient distribution) 狀態，語言的變化也必然呈現「漸層擴散」 (gradient diffusion)，而無所謂「突變」 (abrupt change)。⁹

「波傳論」可以說是「連續性理論」的運用。因為語言的擴散既然是由一點向外擴散，同心圈的順序，由中心到周邊不但是擴散能量成連續性分布，擴散的時間也成連續性分布。任何語言由插入點開始擴張或擴散，在正常的情形下一定是像波傳論所描寫的，由一個點開始向外成連續性擴張，不會有散亂的情形。

柴田武假設有三個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假設有三個方言變體，其形成的時間順序是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那麼這三個具有時間連續關係的變體在空間上的分布，不是 $a-b-c$ ，就是 $c-b-a$ ，沒有其他的組合。就是說空間分布的順序必須和歷時變化的順序一致。柴田把這個原則叫做「鄰接分布原則」。他把「鄰接分布原則」看成是建構語言史的重要原則，他認為變體的分布是歷史的投射，變體在地理上的分布順序，正好反映了歷史變化的順序。可見「鄰接分布原則」是企圖把共時分布與歷時分布拉上關係，柴田說：「語言地理學是語言史的一種方法。」他提出八種「以現代口語材料做為論據推定、構成語言史」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語言地理分布的「鄰接分布原則」和「周邊分布原則」。「鄰接分布原則」是為了解釋常態分布的理論，至於「不連續分布」，比如出現了 b 比 a 或 c 更新，這就破壞了連續性，需要用「周邊分布原則」來解釋。「鄰接分布原則」是「周邊分布原則」的前提，因此他把「鄰接分布原則」放在「周邊分布原則」的前面。

⁹ 語言連續性理論是我在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洪惟仁 2003:§11.3）所闡述的理論。不過這個理論並不新鮮，可以說是語言學的基本共識，只是形式語言學界較少人討論，但在社會語言學和地理學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但是在筆者看來，「鄰接分布原則」和「波傳論」都是連續性擴散的模式。「連續性理論」可以說是比「波傳論」更基本的理論假設，而「鄰接分布原則」和「周邊分布原則」則是「波傳論」在語言擴散史論的運用。

2.5 洪水論

波傳論可以解釋連續性擴散初期較溫和的擴散，由此衍生的所謂「鄰接分布原則」和「周邊分布原則」等理論雖然可以解釋一部分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現象，但非全部。因而洪惟仁 (2010)、Ang (2011) 提出所謂「洪水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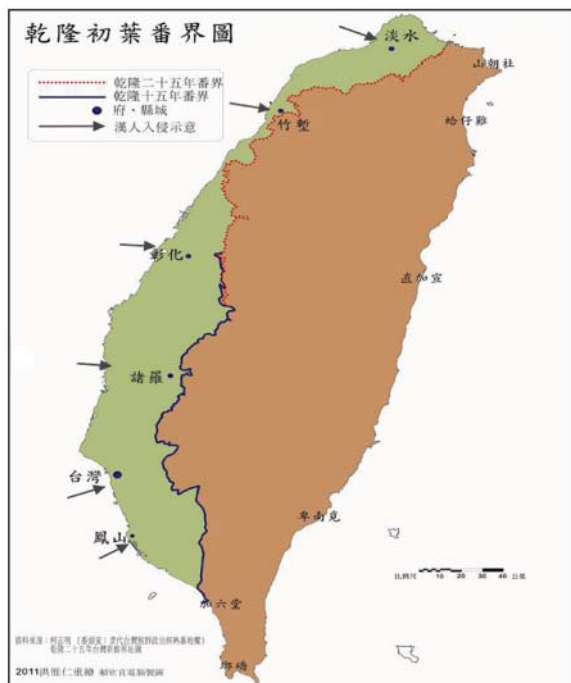
洪惟仁把語言分布的發展分成「插入型」與「包抄型」兩個類型，並認為由插入到包抄是一個連續體。當兩種語言並存於一個地理空間時，語言開始競爭，一個「插入」的語言，如果競爭力夠強，其語言地盤可能越來越擴張，逐漸擴張地盤，終至於「包抄」弱勢語言，甚至併吞被包抄的語言。這樣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競爭，其實已經不能叫做「語言競爭」(language competition)，而是「語言戰爭」(language war) 了。

洪惟仁 (2010)、Ang (2011) 把語言戰爭所引起的語言地盤變動比喻成大雨之後的洪水，謂之「洪水論」(flood theory)。當大雨滂沱、山洪爆發，洪水氾濫，淹沒了低窪地。洪水繼續暴漲，淹沒面積慢慢擴大，沒有淹水的高地越來越小，然後一個一個的高地變成一個一個的孤島，最後完全被洪水吞沒。這種自然現象叫做「洪水效應」(flood effect)。語言戰爭的現象正是這樣的發展。「插入型」的語言，如果競爭力夠強，大力擴張地盤，就像洪水氾濫一樣，發展成「包抄型」的語言。這種強勢語言的地盤擴張就是語言的「洪水效應」。

「洪水效應」是語言競爭的普遍現象。南方漢語普遍存在文白異讀，一般認為，白話音是固有音讀，用本文的術語來說就是「舊語」，而文讀音是後來由中原擴散而來的音讀，就是「新語」。新語由中原向周邊方言擴散，淹沒了白話音。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白話音，只是殘留的部分舊形式。這就是「洪水效應」的表現。

再以台灣漢語與南島語的競爭為例。如〈圖 4〉底圖所示現代台灣的語言分布現狀，漢語的閩南語（綠色部分）和客語（紅色部分）整個包圍著南島語（黃色部分）。從共時的表面分布狀態來看，南島語分布在中央，漢語分布在周邊。如果只根據「周邊分布原則」，那麼我們必須推斷南島語是新插入的，而漢語才是原住民族。不過事實剛好相反。眾所周知，十七世紀以前，台灣全島是南島語的分布區。漢人移墾台灣的初期階段，漢語的分布還處在「插入型」的階段。如〈圖 3〉「乾隆初葉番界圖」所示漢人移墾台灣不是單點插入，而是紛紛由西部港口多點入侵。隨著漢人地盤不斷擴張，點連成面。又參乾隆十五年 (1750) 及二十五年 (1760) 劃訂的「番界」，以西是漢語區，以東是南島語區，顯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台灣的半壁江山幾乎被漢人所佔據了。到了清末、日治初期，整個西部和宜蘭已經全部被漢人所佔，東部花東地區也在漢人掌握中。如〈圖 4〉所示，現在南島語完全被包圍在漢語之中。

假使我們把清代以來不同時代的語言分布圖排列起來，由漢語的入侵，到乾隆時代的番界設置，到現代，南島語的分布區一直在萎縮之中。



〈圖 3〉乾隆初葉台灣番界圖
資料來源：根據柯志明《番頭家》(2001)
附圖重繪 (Ang 2011)



〈圖 4〉漢語包抄南島語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現代語言分布圖 (Ang 2011)
套疊「乾隆初葉台灣番界圖」

漢語入侵台灣之初被南島語包圍，屬於插入型的語言，但由於強勢的語言競爭力，逐漸發展為和南島語平分秋色（如〈圖 3〉所示），最後包抄了南島語（〈圖 4〉）（以上詳參 Ang 2011）。這就是台灣語言戰爭展演了漢語「洪水效應」發展的全程。

總之 a-b-c 分布類型中位於中央的南島語才是原住民的舊語，而周邊的漢語是新語，這違反了「周邊分布原則」的預測。這個反例證明「波傳論」、「周邊分布原則」只看到語言擴散的初期「插入型」發展階段的現象，後期「包抄型」發展階段的現象只能用「洪水論」才能解釋。¹⁰

「洪水論」不是為了反對「波傳論」等發展論而創立的，我們只是認為必須先建立「洪水論」來補足波傳論、鄰接分布原則、周邊分布原則的理論缺口，才能完全解釋「語言」地理分布發展史的「全程」。「洪水論」可以涵蓋「波傳論」及其延伸的「周邊分布原則」，但這些理論不能解釋「全程」，因而不能涵蓋「洪水論」。

¹⁰ 雖然柴田解釋的是語言變體，本文的例子是語種競爭，但我們認為只要是連續性的擴張，不論是語言形式變體或具體語種的競爭，基本原理都一樣要服從「洪水論」所述的語言競爭原理。

3. 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類型

研究語言地理分布如何擴散的模式理論謂之「擴散論」，研究擴散之後如何發展成不同的類型的理論謂之「類型論」。「擴散論」和「類型論」構成「發展論」的整體。

如前所述，「周邊分布原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但只能解釋「插入型」發展階段，不能解釋「包抄型」的發展。如果我們希望建構普遍的發展論，解釋所有的語言地理分布發展，顯然需要更概括性的「類型論」。因為擴散的期程有前、有後，不同的期程表現不同的類型。就插入型的發展階段而言，插在中間的語言是新語；就包抄型的發展階段而言，中間被包圍的語言是舊語。因此單純從表面的分布狀態無法判斷何者是新語，何者是舊語。判斷分布在中間的語言是新語或舊語的前題必須先決定是語言分布發展的那一個階段。由此看來，「發展論」無可避免的先要解決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類型」問題。必須先建立「類型論」，才能進一步進行歷史語言學或語言史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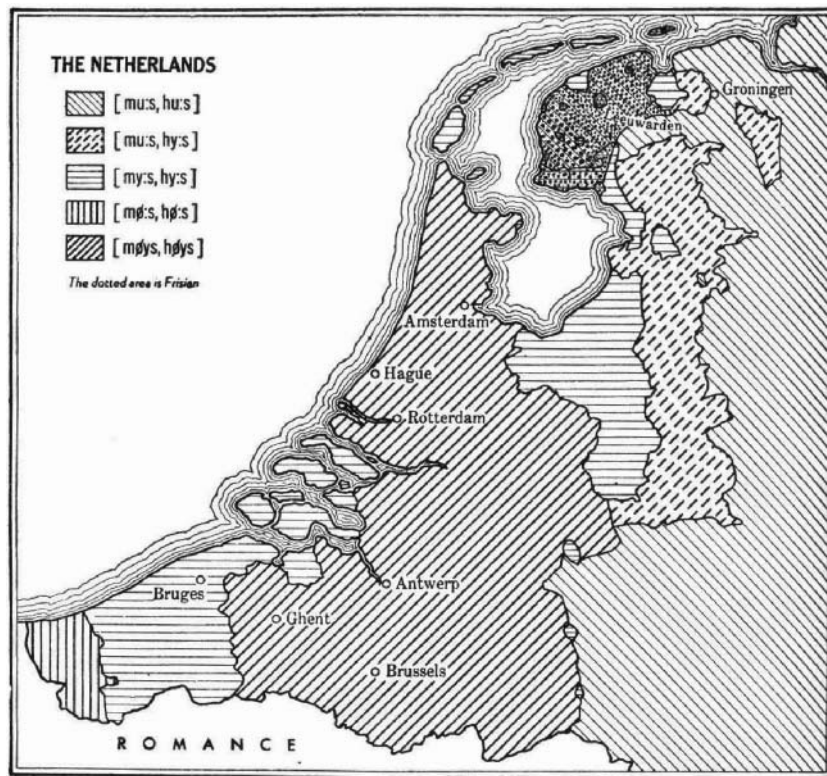
以下介紹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類型論」。

3.1 Bloomfield 的二分法

約和柳田國男發表「方言周圈論」(1930)的同時，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¹¹ 在 *Language* (1933) 一書也提出類似的理論。〈圖 5〉是荷蘭德語「鼠」和「屋」的韻母變體分布圖。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出來，德語的 [-u:s] 韻母到了荷蘭之後慢慢變成 [-u:s]/[-y:s] 的混合，接著往西變成 [-y:s]，再進一步變成 [-ø:s]（分布在 Bruges 附近）。這些變體雖然形式有異，但都是圓唇長單元音，元音的舌位變化也隨著漸變的軌跡，由後→前，由高→中，呈現了 a-b-c 的漸層變化狀態，並不違反連續性原則。但是請注意，荷蘭內部穿插著一個雙元音 [-øys] 的分布區，荷蘭最大城市 Amsterdam、Hague 就在這個區內，可見這個變體的競爭力相當強勁。Bloomfield 指出，[-øys] 的雙元音變體是中心地帶發展的「新語」，屬於「插入型」的發展模式。

這個例子合乎「方言周圈論」或「周邊分布原則」的預測，但 Bloomfield 只指出類似「周邊分布原則」的說明，沒有提出類似的術語來指稱這樣的現象。也許因為對他而言這個例子只是代表一種發展論的「類型」，並未企圖據以建立擴散史論的「原則」。

¹¹ Leonard Bloomfield 1887 年四月出生於芝加哥。他對語言學的興趣起於進 Wisconsin-Madison 大學研究所，學習德語音韻學及印歐語言學，後轉 University of Chicago 從 Wood 學德語歷史語言學，1909 年獲博士學位，後又前往德國學習梵語，建立其在印歐語歷史語言學的基礎。他企圖把行為主義學派 (Behaviorism) 應用到語言學，建立「語言學的科學基礎」，引導美國發展「結構語言學」。他的名著《語言論》(*Language*, 1933) 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進行過菲律賓 Tagalog 南島語的調查，但最大成就在印地安語系 Algonquian 語描寫語言學及歷史語言學的研究。



〈圖 5〉荷蘭語「鼠」和「屋」的變體分布圖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 19 章插圖

Bloomfield 在同書 *Language* (1933) 中又舉了東歐發生的一個包抄型發展類型。〈圖 6〉「東歐拉丁語分裂圖」顯示屬於拉丁語系的羅馬尼亞孤立於拉丁語系的分布區之外，和同屬拉丁語系的義大利之間發生斷裂，而被芬匈語系的匈牙利語以及波蘭、俄羅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的斯拉夫語系語言所包圍。

從羅馬尼亞的地理位置來觀察，按照「周邊分布原則」的預測，羅馬尼亞應該是插入的新興語言才對，因為它和周邊的斯拉夫語言構成 a-b-a 分布。可是 Bloomfield 根據史實說拉丁語系的語言本來是相連續的，因為中世紀斯拉夫語的入侵造成羅馬尼亞和拉丁語系的分布區斷裂，接著九世紀馬加兒 (Magyars) 匈牙利語入侵，共同包圍了羅馬尼亞。總之，羅馬尼亞並非「插入」的語言，而是被斯拉夫語系語言以及匈牙利語所包抄了。換言之，分布在羅馬尼亞周邊的語言不是「舊語」而是「新語」，這是一個「包抄」型的發展類型。

Bloomfield 的興趣不是從語言分布的表面狀態來判斷中間的語言是新語或舊語，只是平實的提出有兩個不同的發展類型，但已經為語言分布發展類型論做了歸納，因此我們把他的論述看成是二分法類型論的代表。



〈圖 6〉東歐拉丁語分裂圖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 18 章插圖

3.2 Bártoli 的四分法

和柳田國男同時，但比柴田武 (1969) 更早提出「周邊分布原則」的是 Matteo Bártoli (1873–1946)，¹² 他於 1945 年提出了所謂「四個準則」（義大利原文 *le quattro norme*，英譯

¹² Matteo Bártoli (1873–1946) 出生於今克羅埃西亞 (Croatia) 的 Albona (Lebin)，奧匈帝國維也納大學博士，曾師事名語言學家梅耶 (Wilhelm Meyer-Lübke, 1861–1936)，後來在巴黎跟日葉隆 (Jules L. Gilléron) 學習語言地理學。34 歲 (1907 年) 即被認定為古典及新拉丁語的傑出教授。著有《新語言學概論》(*Introduzione alla neolinguistica*, 1925)、《區域語言學論文集》(*Saggi di linguistica Spaziale*, 1945) 等。《義大利語言地圖集》(*L'Atlante Linguistico Italiano* (ALI)) 是 Bártol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設計並開始運用國家經費進行調查。但 1952 年 Bártoli 過世後才完成調查，到 1995 年才出版第一卷，1996 年出版第二卷，1997 年出版第三卷，1999 年出版第四卷。其蒐集的資料總量相當龐大，包括 7,000 個詞條，五百萬筆語料，一萬張民俗紀錄相片，是世界上最大的方言地圖集、方言語料庫。其詞彙包括一般詞彙、專業詞彙、民俗詞彙，因為資料過於龐大，以及法西斯統治、兩次大戰的影響，直到 1995 年才正式出版，至今尚有兩卷未出刊。初期搜集的語料應該就是 Bártoli 建構他的「四個準則」(*Quattro norme*) 理論的根據。「四個準則」英譯 (*four areal norms*) 在 Bolinger & Sears (1981:209–210) 的書中有介紹，並被項夢冰、曹暉 (2005:58–59) 所引介，該書把 *areal norms* 意譯為「區域模式」，本文直譯為「準則」。

four areal norms)。這裡所謂的「準則」(norma/norm)是基準、規範之義，和柴田武所提的「原則」之意義差不多。他採用這個術語，應該是企圖提出根據語言地理分布的表面狀態判斷新語或舊語的原則，這一點和柳田國男、柴田武語言擴散史論的企圖或用意相同。「四個準則」略如下述：

- (1) 孤立區準則 (Norma dell'Area Isolata/norm of the isolated area)：與世隔絕的區域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
- (2) 周邊準則 (Norma dell'Area Laterali/norm of the lateral area)：原本一致的區域被新語插入，周邊的區域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
- (3) 主區準則 (Norma dell'Area Maggiore/norm of principal area)：分裂的兩個片，大片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
- (4) 晚墾區準則 (Norma dell'Area Seriore (*cioè, più tarda*)/norm of later area)：晚期開發或最後被征服的區域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

用這四個準則作為判斷何者為新語，何者為舊語的「準則」，顯然是建構「發展論」，從而作為語言擴散史論的依據。不過上引所用的措詞似乎不當，如(2)「周邊準則」，既然已經定義為「原本一致的區域被新語插入」，周邊的區域當然「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了，準則還有什麼意義？又「晚墾區準則」，越晚被新語征服的地區，當然「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了，還需要什麼準則？

我們先從「準則」的觀點來檢視這四個準則的意義。首先，所謂「孤立區準則」和「周邊準則」其實是矛盾的，因為這兩個準則所論斷的表面分布狀態都是 a-b-a 的分布，「孤立區準則」論斷 b 是舊語，而「周邊準則」卻論斷 b 是新語。我們到底要根據那一個準則來決定中間孤立的 b 是新語或舊語呢？因為柴田武只提出一個「周邊分布原則」，所以看不出矛盾，但是 Bártoli 把兩個準則並列，就出現了矛盾。

「主區模式」和「晚墾區模式」也是矛盾的，因為兩者的表面分布狀態是類似的，而前者的主要區保存舊語，後者的主要區（晚墾區以外的地區）卻是新語，到底根據那個 norm 來判斷「主要區」是新語還是舊語，無法決定。

Bártoli 企圖把地理語言學做為歷史語言學的一種方法，因此稱自己的理論是「新語言學」(neolinguistics) 或「空間語言學」(Linguistica Spaziale/spatial linguistics)。可是 Chambers & Trudgill (1998:168) 指出這個理論所提出的 norms 互相矛盾，並且 norms 不是「原則」(laws) 只能說是「傾向」(tendencies)。¹³ 因此不論是從邏輯上或理論架構來看，這「四個準則」是大有問題的。如果要把「四個準則」當成是從表面的分布斷定新語或舊語的「原則」，作為歷史語言學或語言擴散史論的方法，顯然是失敗的。

¹³ Chambers & Trudgill (1998:167-168) 說：「Neolinguistics 這個學派最大的問題在於把這些原則 (principles) 看成好像是定律 (laws)，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傾向 (tendencies)。」不過 Bártoli 在說明四個準則也使用「傾向」這個詞。

不過我們傾向於相信 Bártoli 理論的原始用意是要提出地理分布發展的類型論，只是論證的方法有誤。如果我們把這些準則看成是語言擴散史上不同階段的型態或模式，Bártoli 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Bártoli 的「周邊準則」和柴田武的「周邊分布原則」的比重不同。柴田武的「周邊分布原則」是說所有 a-b-a 的方言分布，b 通常是新語，其反例因為很少發生而可忽略；而 Bártoli 的「周邊準則」和「孤立區模式」一視同仁，各為四個 norms 中的一種。中間的 b 在「周邊準則」是新語，在「孤立區模式」是舊語。由「類型論」的立場看來，Bártoli 的理論比柴田武理論更具概括性意義。

Bártoli 理論的矛盾只有理解成「發展階段的不同模式」，¹⁴ 賦與類型論的意義，理論才有價值。從類型論的立場來理解，以上所講的四個「準則」（或譯為「模式」），正好反映了一種有競爭力的語言擴張地盤的全部過程的四個階段（詳參下文 4.2 節）。

經過我們重新詮釋、賦與新義的 Bártoli 理論，顯示具有相當大的概括性和解釋力。因此我們把 Bártoli 當成語言地理分布發展類型論「四分法」理論的創始者。

4. 連續體發展的類型論

以上介紹了語言發展類型的 Bloomfield 的二分法和 Bártoli 的四分法，雖然他們的本意不一定是真正要建立「類型論」。本節要討論的是，到底二分法還是四分法比較正確，或者比較好；其次，這些分類是根據表面的地理分布狀態配合歷史發展的事實「歸納」出來的嗎？如果是歸納出來的，那麼他們已經看到所有的發展類型了嗎？是否可能再出現其他的類型呢？

4.1 由插入到包抄的連續性發展

洪惟仁 (2010, 2013) 將語言分布的地理分布發展分成「插入型」與「包抄型」兩個類型。前者指新語插入一個舊語分布區，新語被舊語包圍的情形；後者指新語包抄舊語，舊語被新語包圍的情形。若從歸納法的角度言，洪惟仁並未超出 Bloomfield 的貢獻，比起 Bártoli 的四分法也不夠細緻。但問題的重點在於「洪水論」(Ang 2011) 把語言分布的「插入型」、「包抄型」看成是兩個極端而相對的類型，指出由「插入」到「包抄」的發展是一個「連續體」。「插入型」、「包抄型」不只是歸納結果，同時也可以由語言連續性理論演繹出來。

「洪水論」並未否定「波傳論」，而是就波傳論的基本模式，加上擴散力道與時間縱深的考量，進一步加以延伸與發展。也就是說洪水論對於波傳論加以延伸或加強，而不是提出了反對的理論；洪水論也沒有否定「周邊分布原則」，只是把周邊分布原則的理論涵蓋性限定為新語插入的初期階段，而企圖提出涵蓋整個語言擴散全程的理論。

由上文 2.5 節所舉的台灣漢語與南島語競爭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十七世紀漢語開始由西海岸「插入」南島語的分布領域，然後急速擴張，到十八世紀中葉漢語和南島語平分秋色，

¹⁴ 項夢冰、曹暉 (2005) 把 norm 譯成「模式」是由其類型論的意義出發，看來也是合乎其本意的翻譯。

到了二十世紀已經完全把南島語的分布區包圍了，這是不折不扣由「插入」到「包抄」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每一天都在進行，無時中止，由「插入」到「包抄」的發展全程是一個連續體，無法切分。

我們再回頭來看 Bloomfield (1933) 所舉的「東歐拉丁語分裂圖」(〈圖 6〉)，雖然表面的分布狀態是芬匈語系的匈牙利語及斯拉夫語系語言共同包圍著羅馬尼亞，中間的 b 語言是舊語，但是如果從拉丁語的大格局來看，中間的匈牙利語及斯拉夫語系的 b 語言是插入的新語。觀察的角度不同可以做出矛盾的解釋。

再看中國的例子。中國的湘語和吳語有三元對立(阻音有兩個清音，一個濁音)，中央地帶的贛語、客語、粵語只有二元對立(阻音有兩個清音，沒有濁音)的分布狀態，為什麼會這樣分布？受到「波傳論」及「方言圈論」的啟發，橋本萬太郎 (1981:348-352) 判斷贛語、客語、粵語是插入的新語，而湘語和吳語是原本的南方漢語。他認為這是北方移民南遷形成的新語沖破了南方三元對立聲母連續體的分布狀態。¹⁵ 橋本的「贛、客、粵語插入論」如下圖(〈圖 7〉)所示：



第55圖 3項対立の地理的ひろがり

〈圖 7〉橋本萬太郎「三維對立的地理擴散」
資料來源：橋本萬太郎《現代博言学》(1981:350)

¹⁵ 至於閩南語雖然也是三元對立，但橋本萬太郎 (1981:351) 指出，閩南語的濁音是由鼻音變來的，濁音是新興的變體，和本文討論的「全濁清化」是兩回事，所以不能算是「三元對立」的類型。閩語雖然也是南方漢語，但是跟北方漢語一樣沒有濁音。南閩語和北閩語的差異是，南閩語發生了鼻音去鼻化，因而新生了濁音，北閩語沒有濁音。

橋本萬太郎的官話插入說，受到歷史學有關北方民族南遷的史實支持（詳參周振鶴 1990）。但是這個觀點是從湘語-客贛粵語-吳語的相對關係來說的。插入初期的 a-b-a 式分布狀態，b（贛語、客語、粵語）是新語，而 a（吳語和湘語）是舊語。但是從結果來看，吳語和湘語都是被包圍在二項對立的「新語」之中。特別是湘語，如〈圖 7〉所示完全被北方官話、西南官話和客、贛、粵語所包圍。換言之，聲母二元對立的北方漢語從江西向南插入南方漢語分布區，把三元對立的南方漢語切成爲兩大塊，在東邊包圍了吳語，然後西南官話又從雲南、廣西南下聯手包抄了湘語。而湘語和吳語都是 a-b-a 分布模式的 b，它們都是舊語。觀察的角度不同同樣做出矛盾的解釋。

由插入到包抄所需要的時間可能只要幾百年（如台灣），可能需要上千年（如斯拉夫語之於羅馬尼亞，北方漢語之於南方漢語），如果我們只看其中一個階段，比如初期階段，我們可能歸納出「周邊分布原則」（如柳田國男、柴田武）；如果看到前後階段，就可以歸納出兩個類型（如 Bloomfield 的二分法）；如果看到發展的全程，就可以歸納出更多的類型（如 Bártoli 的四分法）。

再說，同樣的分布關係，由局部和由全局來觀察可以歸納出完全不同的分布模式，做出完全矛盾的解釋。由此可見，從局部空間或時間的表面分布狀態來歸納發展類型是沒有意義的，企圖根據其分布類型作爲語言擴散史的論斷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我們了解到語言地理分布的發展由插入到包抄是一個連續體，那我們就應該認真考慮利用「歸納法」進行所謂的「分類」有何意義，以及是否可能建立具有「演繹法」意義的類型論。

4.2 類型論

分類的方法有歸納法和演繹法。在科學發展的初期，「歸納法」是不得已的假設性分類，但是科學發展的結果一定要達到「演繹法」的水準才有理論價值。所謂「演繹法」就是根據前提假設，進行邏輯推演所建構的理論體系。如果前提是錯的，沒有辦法證明是無反例存在的普遍適用原則，結論當然是錯的，如果前提是對的，可以證明是無反例存在的普遍適用原則，合乎邏輯推理原則，那麼結論當然是對的。我們的「語言連續性」假設、語言發展由插入到包抄是一個連續體的假設至今沒有出現反例，這個前提應該是對的，那麼只要設定一定的標準 (criteria)，對這個連續體進行分類，所分的「類」都是根據一個標準衍生出來，這樣的分類是科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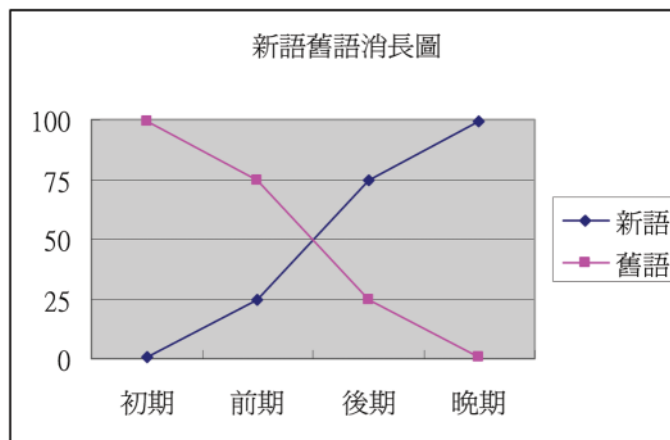
傳統語言學採用「歸納法」的分類往往只從散亂的表面狀態作歸納，分類之前沒有總結一個可以證明爲真的前提，分類時也可能沒有一定的標準，或有多重標準，這樣的分類難免任意性，是不科學的分類。

語言地理分布的發展，由插入到包抄既然是一個連續體，連續體可以作無限的切分，理論上語言的擴散過程可以做無限的分段，因此分爲幾個階段，賦與類型論的意義，不是理論對錯的問題，而是實用的問題。

從實用上說，分類太多，類與類之間的區別不明顯，類與類之間沒有達到可以察覺的地步，只顯示漸層變化的狀態，這樣的分類沒有意義。如果分類太少，又顯得不夠用。分為幾類才夠用，要看使用者的目的而定。譬如一個月 29.5 日，從初一到三十，月亮由暗轉明，再由明轉暗，是一個周期。每一天晚上月亮圓缺的狀態都不同，甚至每一個小時都不同。但是如果按日來切分，一個月可以分成 29-30 種，這樣農曆的日期已經分好了，分類就沒有什麼意義；如果按小時來切分，一個月就可以分成 708 種，這樣的細分在研究上可能有意義，實際上每一種圓缺的情形沒有明顯的分別，也沒有實用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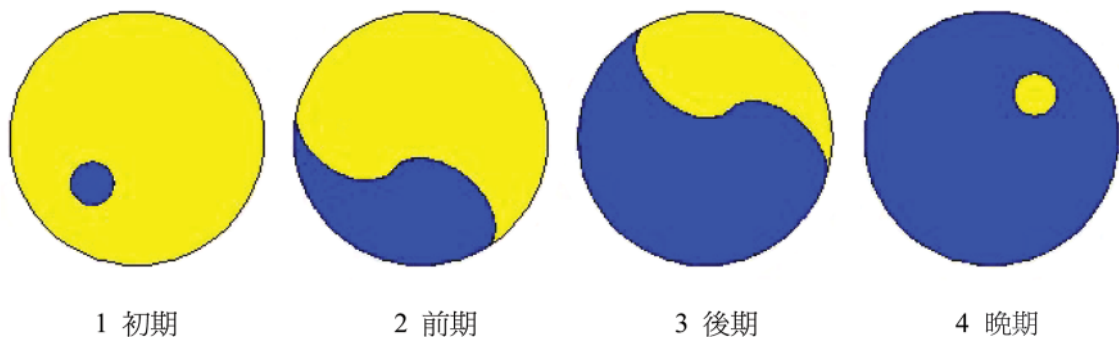
連續體的發展，最好的例子是月亮盈虧消長的時段劃分。月亮的盈虧狀態最簡單的分類就是根據表面狀態分為盈、虧或圓、缺兩種。但一個月由月全暗到月圓（上半月），由月圓到月全暗（下半月）構成一個連續發展的周期，其盈虧通常分為五個時間點：暗月、上弦月、滿月、下弦月、暗月。五個切分點，等於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把一個連續體平均切分，通常像切大餅一樣，一刀切成兩塊，兩刀分為四塊，再兩刀分為八塊……。但參考月亮的盈虧狀態的切分，或一年四季的切分，連續體最常用的是平均分為四個階段。一定的地域，新語與舊語的競爭、消長，既然是連續體，最容易理解的是平分成四階段。按照這個構想，可以把語言競爭中新語與舊語的消長全程切分如下圖所示：



〈圖 8〉新語舊語消長線性發展圖

上圖是普遍出現在人文科學論文中顯示消長變化的圖，新語、舊語各呈鐘形曲線，便於理解競爭的語言在空間消長的發展模式。把一個新語由插入一定空間，繼續擴張，逐漸包抄舊語的過程，另外用四個圖例來代表四個不同的空間發展的階段，如下圖所示（〈圖 9〉深色表示新語佔有空間，淺色表示舊語佔有空間）：



〈圖 9〉新語舊語地盤消長階段示意圖

上圖表示語言分布發展的四個階段。

- 1 初期：新語（深色點）插入初期被舊語包圍；
- 2 前期：新語繼續擴散，佔據了部分舊語地盤；
- 3 後期：新語繼續發展，佔據了大部分舊語地盤；
- 4 晚期：新語取得絕對優勢，包圍了舊語。

把整個語言分布發展各個階段新語、舊語競爭的情形，套用 Bártoli 的 norms，就變成四個發展類型，對比如下表：

〈表2〉語言發展連續體切分表

二分法	插入期		包抄期	
四分法	初期	前期	後期	晚期
新語勢力	弱勢	成長	優勢	強勢
舊語勢力	強勢	優勢	萎縮	殘存
空間分布模式	周邊模式	主區模式	晚墾區模式	孤立區模式
新舊語的空間關係	新語在中央 舊語在周邊	新語在次要區 舊語在主要區	新語在主要區 舊語在次要區	舊語殘存於 孤立區

這是兩個語言競爭之下語言分布發展的標準模式。上表清楚顯示新語由插入到包抄可以分為兩個或四個發展階段，每一個發展階段顯示了和柳田國男、柴田武、Bártoli 等地理語言學發展論學者所關心的舊語保存情形的對應關係。

以上的類型只是一種模式，實際的發展狀態可能千差萬別，比如〈圖 4〉所示一個插入的新語，插入點可能在舊語分布區的邊緣（如閩南語入侵台灣的初期），但也可能從中間插入（如客語在台灣發展特定分布區，一開始就是被閩南語或南島語包圍的）。地理分布狀態

及變化消長的形態千奇百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都不一樣，不是像月亮盈虧消長或〈圖 9〉所示的那麼規則、整齊，但其發展模式必然如上圖和上表所述。

總之，連續體可以切分為兩階段（插入期與包抄期），也可以再細分為四階段，也不妨分為三段，¹⁶ 相應地把發展類型分為二類、四類或三類。分為幾段或幾類只是技術問題，重點是這些分段或分類，是由「連續體」的概念演繹出來的。這樣的分類可以說已經達到演繹法的層次。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本文討論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但把焦點放在「連續性擴散理論」，不討論「不連續性擴散」及其理論。

第二節討論語言地理學發展論中的「擴散論」。由施密特的「波傳論」介紹到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柴田武的「周邊分布原則」，然後導入語言連續性理論、柴田武的「鄰接分布原則」，最後提出的「洪水論」，認為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全程其實是一個連續體。

第三節討論語言地理學發展論中的「類型論」。檢討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連續體分類的可能性，亦即如何分段的問題。本文介紹了 Bloomfield 的二分法和 Bártoli 的四分法，並加以理解為「類型論」的理論先驅。

但本文第四節認為分為幾個階段不是理論對錯的問題，而是實用問題，本文支持四分法是因為它最為方便進行演繹法的分類。

本文提出語言地理分布「發展論」的理論架構，這個理論具有普遍性，可以適用於所有語言或方言等語種 (varieties) 在地理上的變化，也可以適用於所有語言或方言的形式變體 (variants) 在地理上的擴散。

5.2 討論

5.2.1 連續體的演繹法分類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語言地理發展論的極盛時期，東方的柳田國男、柴田武以及西方的 Bloomfield、Bártoli 分別同時提出了一些語言地理分布發展的類型或模式，不論是為了解釋局部的或普遍的現象，不論其理論本身是否有所侷限或缺陷，我們在評論這些傳統的地理語

¹⁶ 譬如一個月可以分為上旬、中旬、下旬三個階段。Chambers & Trudgill (1998:167–168) 介紹 “neolinguistics” 或 “spatial linguistics” 時就只列出三類：isolated area, peripheral area, larger area。

言學理論時，其實是懷著感動與感謝的。因為他們都是企圖在建構語言地理分布的發展論，每一種理論的提出都是地理語言學進步史上的里程碑。只可惜這些理論之間似乎沒有對話。當代人沒有辯論，現代人對過去的理论也沒有檢討，地理語言學理論沒有呼應語言學潮流的發展。

地理語言學發展論的提出距今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二十世紀是語言學蓬勃發展的時代，語言學理論日新月異，唯獨地理語言學幾乎是原地踏步，許多非常有創造力的理論都是一九三〇年代左右提出的，此後地理語言學理論上的進步相當有限。這是為什麼？地理語言學的成本效益很低，一張地圖的繪製需要極龐大的經費、人力、時間，要建構一個理論需要相當數量的地圖，需要和其他學門作跨領域合作，理論建設相對困難得多。這雖然是事實，但不能作為我們地理語言學者自我脫罪的說辭。

當知沒有理論的地理語言學不但沒有發展的前途，也不會受到語言學界的尊敬與重視。雖然地理語言學者都很努力地繪製語言地圖，但是地理語言學一直被當成是邊緣學科，主要原因在於地理語言學一直停留在語料搜集、地圖繪製而缺少理論；地理語言學者之間缺少對話，不但當代的學者之間沒有對話，現代學者對地理語言學前輩也缺少認識與尊敬，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地理語言學者需要反省的地方。

地理語言學的理论為什麼進步緩慢？主要原因是傳統語言學過度依賴歸納法的分類，以為語言地理學理論必須把所有語言分布的現象都「發掘」出來，才能歸納出理論。但是語言分布發展的實際狀態，無論如何是發掘不完的。傳統語言學被衍生語言學家批評為「分類的語言學」(taxonomic linguistics)，這個名詞帶有輕蔑的意涵(pejorative implication)。分類是地理語言學上相當重要的工作，但是如果過分依賴歸納法，分類的方法沒有達到演繹法的理論層次，將不能贏得現代語言學家的重視。

5.2.2 地理語言學跨領域研究的必要性

另外，既然語言分布發展類型是一個連續體，如上所述，初期與晚期發展階段是相反的，但表面分布狀態相似，前期與後期也是相反的，但表面分布狀態也相似，因此雖然前人企圖根據表面狀態來判斷新語或舊語，甚至相信地理語言學的發展論可以取代歷史語言學，其實是失敗的。從本文的論證看來，語言史的論斷不是靠地理語言學本身的獨立論證，往往必須求助於歷史學的、歷史語言學等的研究成果，互相參證。

我們承認在地理語言學的「生成論」方面，普通語言學的解釋是相當重要的，至於發展論，地理語言學提出的「原則」，基本上只有洞察力而沒有證明力。雖然地理語言學的洞察力對於歷史語言學或語言史研究有重要的啟示，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清楚的呈現語言變化的「過程」，因此對於歷史語言學、語言史或歷史學的研究有重要的貢獻；但是地理語言學的發展論不能取代歷史語言學或歷史學，地理語言學，必須和普通語言學、語言類型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乃至地理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進行跨領域合作。

引用文獻

- Ang, Uijin (洪惟仁). 2003. *Yinbian de Dongji yu Fangxiang: Zhang-Quan Jingzheng yu Taiwan Putongqiang de Xingcheng*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ii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Ang, Uijin (洪惟仁). 2010. Taiwan de yuyan dili: bulianxu fenbu de jieshi 台灣的語言地理：不連續分布的解釋 [For geolinguistics of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non-continuous distrib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Geolinguistics, November 21–22, 2010.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Ang, Uijin. 2011. The flood effect in language wa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April 15–17, 2011.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 Ang, Uijin (洪惟仁). 2013. Charu yu baochao: yuyan dili fenbu de fazhan leixing 插入與包抄：語言地理分布的發展類型 [Intrusion and outflanking: pattern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Hanyu Fangyan de Dili Yuyanxue Yanjiu* 漢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Geolinguistic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s], ed. by Zhiyun Cao, 20–3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Bartoli, Matteo. 1945. *Saggi di Linguistica Spaziale*. Turin: Bona.
-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olinger, Dwight, & Donald A. Sears. 1981. *Aspects of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hambers, Jack K., & Peter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himoto, Mantoro J. (橋本萬太郎). 1981. *Gendai Hakugengaku* 現代博言学 [Modern Linguistics]. Tokyo: Taishukan Shoten.
- Onagita, Kunio (柳田國男). 1930. *Kagyū Ko* 蝸牛考 [A Study of Variants of Escargot]. Tokyo: Toko Shoin.
- Onagita, Kunio (柳田國男). 1961. Watakushi no hogen kenkyū わたくしの方言研究 [My research in dialectology]. *Hogengaku Koza* 方言学講座 [Dialectology Course] 1:330–320. Tokyo: Tokyodo.
- Shibata, Takeshi (柴田武). 1969. *Gengo Chirigaku no Hoho*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 [Methodology of Geolinguistics]. Tokyo: Chikuma Shobo.
- Tokugawa, Munemasa (徳川宗賢). 1993. *Nihon no Hogen Chizu* 日本の方言地図 [Dialect Maps of Japan] (Version 21). Tokyo: Chuo Koronsha.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 Hui Cao (曹暉). 2005. *Hanyu Fangyan Dilixue: Rumen yu Shijian* 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 [Geodialectology of Chinese: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Zhou, Zhenhe (周振鶴). 1990. Xiandai Hanyu fangyan dili de lishi beijing 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dialectal geography]. *Lishi Dili* 歷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9:69–80.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Received 21 February 2013; revised 12 August 2014; accepted 15 December 2014]

68, Lane 62, Fu-chiang West Road
Chungli, Taoyuan 320, Taiwan
anguijin@gmail.com

Theories of Diffus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Spati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Uijin Ang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a theoretical geolinguistics approach. Following a review of major theories regarding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his study proposes ‘flood theory’ to solve deficiencies in ‘wave theory’. The discussion also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characterizing or classifying a continuum that develops when a new language variety or a new variant spreads across the territory of an earlier language from the initial stages of intrusion to later stages of outflanking. The thesis supports the four dimensional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as it facilitates deductive categorization.

Key words: theoretical geolinguistics, spatial development, diffusion theory, classification theory, deductive categorization